

## 试探民国时期人口思想的合理成分

张福生

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人口思想史的探讨取得许多成果,但对其中民国时期人口思想的研究却颇少。实际上,那时正是我国建国前历史上讨论人口问题最热烈的时期。在当时出版和发表的关于人口问题的专著和文章中,虽然有些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非常错误的,但关于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办法的某些建议,却有许多合理成分。有些建议在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有的甚至接近我国当前的人口政策及其实施办法。例如,对中国近代高出生率的原因进行中肯的分析;提议把降低人口出生,提高人口质量作为人口政策的目标;建议把节制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提倡适度人口的思想;要求人口与物质资料生产和资源相适应;并提出实施节育、优生和教育的具体措施。本文试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求从中吸取合理成分,探求它与我国现行人口政策的联系。

### (一)

民国时期,我国总人口达4亿多,最后又突破5亿,达历史最高峰。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和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国内政局混乱,民族经济惨遭破坏,民不聊生。时值马尔萨斯主义已传入中国,一些人运用马尔萨斯主义观点,把人口太多说成是天灾人祸的根源,而人口多又由人口优于生活资料增长这个自然规律造成。但有些学者却截然不同,他们立足于实际,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中国人口增长情况及其原因,进行中肯的分析。

1923年,易家铨发表题为《中国人口问

题》的文章,认为:“中国不独有高出生率,而且有高死亡率”,两个现象并存。他进一步分析了引起高出生率的原因:在政治方面,“以为人口多则国富,……以为人口多则国强”;在社会方面,“早婚的弊病,在中国特甚。结婚过早则生子必多”,“视人多生子是中国人的习惯”,“立嗣制度,有促成中国人口稠密的倾向”;在宗教及伦理方面,“中国人以为无子是前世孽报”,“中国的圣人以为无子是大不幸”;在经济方面,“遗产制度的遗毒,在中国尤甚”,“农业国的生产率(即生育率——引者),较高于工商业国,而中国为农业国”,“低生活与低工资的国家,人口必众,而中国属于此类”。谈到人口高死亡率的原因时,他说,“内乱是中国人口高死亡的总原因。”<sup>①</sup>

然而,人口高出生率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造成人口高死亡的内乱,其根源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无论如何,作者对我国高出生、高死亡的直接原因阐述得较全面,分析中肯,为我们研究我国人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原因起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 (二)

怎样解决我国人口多、生育率高的问题?当时许多学者已把节制生育视为最理想的方法。1926年,罗宏顺在题为《高生殖率的中国人口问题与民族前途》的文章中指出,“高生

<sup>①</sup> 易家铨,中国人口问题,民铎,1923,4,2

殖率与贫穷是并行的互应的”，“高生殖率不适于民族的进步”，要把高生殖率引到低生殖率的路上，“我们现应提倡和实行‘生育节制’<sup>①</sup>。陈达在其《人口问题》一书中提出，生育节制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sup>②</sup>。马寅初在他的《经济学概论》一书中说，解决中国人口问题，除发展经济外，还要“厉行生育的节制，盖非节制生育，恐仍无补于事也”<sup>③</sup>。陈长衡把迟婚节育等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称“生育革命”。他历数迟婚节育的好处：“可维持人口与领土均衡”、“生活丰裕完美”、“失业者亦寡”、“罪恶较少”、“结婚慎重”、“子女健康”、“婴儿死亡率低”、“学术昌明”等。总之，“迟婚节育愈普遍，中国之进步亦愈速”<sup>④</sup>。

有些学者不赞同生育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主张把“迟婚节育”作为国家的政策，由国家统一管理。陈长衡在其《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一书中，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不注意人口增长的规律，不研究预防人口过快增长的办法和优生的科学技术，在生育问题上“完全听取民自生自养，必定弄到文化衰败，乱轮常转，种族遭受惨酷的淘汰”的地步。<sup>⑤</sup>乔启明主张迟婚节育“非由政府举办不可”<sup>⑥</sup>。戴世光在他的《论我国今后的人口政策》一文中认为，减少人口的“唯一方法自然是节制生育”，为了强调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我们不妨称之为‘人口革命’，与工业革命、社会革命列为我国三种必须变革的基本国策”<sup>⑦</sup>。这种见解得到当时吴景超等学者的赞同。把节制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这个建议能够在那个年代提出，是很难得的。今日读之，倍感其远见卓识。

戴世光还在同一篇文章里，提出节制生育的具体方案，“整个节育计划应以农村为重心”；“实施教育、卫生、节育联合推行的制度”；“国家对节育方案的执行须具有相当的强制性，……规定凡已经有两个婴儿的父母，必须到医院受永久节育手术”；“普遍的实施

老年恤金制度或设立老人院，庶免‘养儿防老’的顾虑和解除老年无依的寂苦”。这个方案已十分接近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有关规定。但其中“对节育方案的执行须具有相当的强制性”的说法，与我们现在的国家指导和群众自愿相结合的方针不相符合。

### (三)

中国究竟多少人口合适？怎样确定这个适度数字？当时世界上正在流行的适度人口论，影响着我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探讨。陈长衡在他的《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一书中，提出人口“适中的密度，是人口压迫降到零点时的密度，是国家种族最适于生存进化的密度。”而确定这种理想的人口密度目标，“全视吾人所假定的生活标准如何为断”。1935年，他又发表文章，否定这种单纯以经济目标来断定人口适度与否的观点，提出了适度人口的综合性目标。他说：“所谓最适当之人口大致有几种不同的含义：有专就经济方面空论者，以为一个国家在每人平均国富最大或所得最多时的人口便为最适当的人口，惟此种观念颇嫌过于单纯。正当的含义应使全体人口在经济、国防、政治、社会、教育、文化及优生、卫生种种方面皆最为安全健康和最为丰富文明。”<sup>⑧</sup>。

把能否取得“最大收益”，或“提供按人均最大收益”，或“按人均取得最高收入”，作

① 罗宏顺，高生殖率的中国人口问题与民族前途，东方杂志，1926，23，23。

② 陈达，人口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③ 马寅初，经济学概论（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

④ 陈长衡，中国近百八十余年来人口增加之徐速及民势之变迁，东方杂志，1927，24，18。

⑤ 陈长衡，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⑥ 乔启明，中国乡村人口问题之研究，东方杂志，1928，25，21

⑦ 戴世光，论我国今后的人口政策，新路，1948，1，5

⑧ 陈长衡，我国土地与人口问题的初步比较研究及国民经济建设之政策商榷，地理学报，1935，2，4。

为人口适度目标,是早期适度人口论的看法。早期适度人口论主要研究“经济适度人口”。把人口适度目标扩大到非经济领域是当代适度人口论的特点,尤以1952年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索维在他的《人口通论》一书中,提到的九个特定目标为典型。<sup>①</sup>陈长衡在三十年代就提出,用多种目标来衡量人口适度与否,可以说我国学术界对适度人口问题的研究,在那个时代并不落后。

然而,人口数量与上述所谈到的理想目标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人口数量由物质资料生产对劳动的需求所决定,理想的目标由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去实现。撇开物质资料生产,人口的适度问题和理想的目标,将陷入空谈。马寅初在谈人口适度问题时,加入了物质资料生产的因素。他说:“今日论坛之重心,在寻求一最适宜数之人口。最适宜人口,即扩充当时之土地资源,提高生产技术,估计可以容纳之最高人口数。一面研讨生命统计,务‘使人口之出生率与死亡率减至最低度,使财富之生产额,止于报酬递减之起点,各人享受之财富,又达于最高点’”。<sup>②</sup>马寅初把物质资料生产的因素,即“扩充当时土地资源,提高生产技术”作为人口适度的前提,并要求“财富之生产额,止于报酬递减之起点”,由此给适度人口思想注入了科学成分。当然,他还对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提出了要求,而其理想目标又仅限于“各人享受之财富,又达于最高点”这个单纯的经济目标上。

戴世光所谈的人口适度问题更为深刻,更趋科学,试探到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的规律。他在《论我国今后的人口政策》一文中提出,为了使人口“寻得一个适中的数量”,要求“人口的多少必须配合资本和自然资源”。从这个观点出发,他提出,人口密度、资源和工业发展各不相同的国家,除发展经济外,至于人口数量是增加、减少还是维持原状,完全由工业发展水平和所拥有的资源决定。例如,其中谈到,如果一个国家资源有

限、工业基础薄弱,“而人口密度业已很高,生活程度又低,则除去应该集中力量在工业建设以外,必须非同时减少人口数量不可。”

戴世光要求人口与资源和工业发展相适应,为的是实现劳动力与后者的适应。例如,他在同一篇文章里说,一个国家的人口密度相对于它的资源和工业基础来说,如果稀少,“则应增加人口,以增加劳力”;如果过多,则反之。某国或某地域内的人口,只有在其处于劳动年龄期间,能够与生产资料充分结合,不致于成为过剩劳动力,做到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这样的人口对该国或该地域来说,才能真正算作适度人口。戴世光抓住劳动力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也就抓住了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的本质。怎样实现这种适应呢?他的措施如上所述,既发展生产,又解决人口问题。戴世光的上述观点比较科学,能够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的理论。这在那个年代是难能可贵的。

#### (四)

一些学者在反对国内高出生率的同时,提倡优生。在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的关系上,罗宏顺从高出生率有害于优生这个观点出发,认为“高生殖率与优生背道而驰”。他进一步阐述了“过量生育妨碍‘亲体’的健康”的原因:“A. 先天的。依遗传作用,亲体亏弱,儿女先天上一定贫乏;因先天之贫乏,乃减少了后天的疾病抵抗力……B. 后天的。……在高生殖率下的家庭,亲体已失其固有之康健,对儿童的养护自不能周到,而且还要受经济势力之支配。结果因这两种并行的原因而致死亡的甚多,其幸免于死亡的,便强半成为社会

<sup>①</sup> [法]阿尔弗雷·索维在其所著《人口通论》一书中列举人口适度的九个特定目标是:个人福利、增加财富、就业、实力、健康长寿、文化知识、福利总和、寿命总和、居民人数。

<sup>②</sup> 马寅初,《经济学概论(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

之‘不适者’”。<sup>①</sup>许仕廉则从优生有利于节育的观点出发,提出改善人口的品质更能促进节育,“所以,‘数’的问题不靠‘质’的问题了”。在此基础上,他积极提倡“优生运动”。他把优生分为两种,“积极的,是改良种族的原质;消极的,是消除不良的遗传”。<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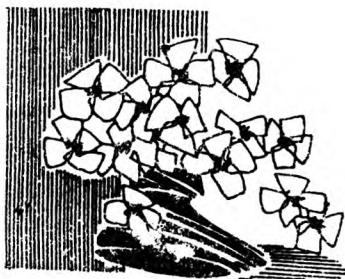
在提倡节育优生的基础上,有的学者提出接近我国现行人口政策的看法。陈长衡认为,“节育”与“优生”两个“并蒂连理”的大运动,能带来我们国家“长治久安”,民族“世代光昌”,人民生活“完全美满,长乐永康”<sup>③</sup>洪瑞坚在1936年发表的《我国是否需要节制生育》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任何国家,最理想的人口现状,该是质和量适当配合,而能维持最高标准的生活,这也是我们人口政策的目标”,所以“除讲究优生之外,还要节制生育”。<sup>④</sup>这里已具备我们现行人口政策即“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主要方面,但把提高人口素质仅局限于优生,则忽视人口后天培养、教育的作用,是其不足的地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是在70年代明确提出的,距洪瑞坚上述看法相隔约40年之久。由此表明,一方面我国人口思想史上早已有了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合理建议;另一方面政局的不安定和左的思想的影响,拖延了确定人口政策的时间,从而加重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洪瑞坚在这篇文章里还提出:“优生问题,要由政府主持,以强制的法律,禁止身心体力不健全的男女有婚嫁生育的权利。”此看法虽不象我们现在法律规定(如禁止近亲结婚及性病、精神病等患者不能结婚)那么具体、确切,但那个时代能提出这样的看法,也是值得赞赏的。

陈达在他的《人口问题》一书里,不仅主张节制生育,而且提倡改善人口品质。他把人口品质的改善当作“我国立国的基础”。他强调要面向工农大众,“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是改善人口品质的急务”。他认为,在“农界与工界,其大多数不能供养儿女们的教育费,这

是改良人口品质一个困难问题”,解决的办法:推广免费教育、增加人民收入和节制生育。在那个时期,不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一切人口品质改善的设想都将落空。但仅就学术而言,陈达上述的观点,至今还很有参考价值。

以上阐述,仅是民国时期人口思想中,部分有代表性的合理成分。这些合理成分分别出自不同学者的著作和文章。而这些学者对其它问题的看法,有的正确、有的则错误,由于与本文论题无关,基本未涉及。上面他们所提的合理建议,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不可能被采纳。但这些合理建议在人们中间却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为我国现行人口政策的制定留下潜在的影响。50年代,以马寅初为代表的学者们指出我国面临的严重的人口问题及解决人口问题的措施,不仅有它的现实的生活基础,而且有其历史的思想准备。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使那些合法的建议最终被付诸实施。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有关规定,可以说是在那些合理建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作者工作单位:秦皇岛市计划生育委员会)



① 罗宏顺,高生殖率的中国人问题与民族前途,东方杂志,1926年23卷23号

② 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

③ 陈长衡,中国近百八十年来人口增加之徐速及民势之变迁,东方杂志,1927年,24卷18号

④ 洪瑞坚,我国是否需要节制生育,政闻周刊,1936,20—21